



书评

《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

黄文斌，《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3。
ISBN：978-983-3908-26-4

白伟权*
(PEK Wee Chuen)

《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之后简称《墓碑集录》）为拉曼大学“马六甲青云亭与三宝山原始编纂计划”中的成果之一，该计划是由拉曼大学黄文斌教授为主要执行。黄教授于2009年至2012年间，多次带领学生前往马六甲三宝山，与当地华社共同进行实地调查，当中主要针对马六甲葡萄牙时期至荷兰时期的明清古墓进行收录，包含了173座明代和清代的古墓，以及32座团体公冢。作者将这些墓碑资料整理成三大篇章，除了呈现明清墓碑的“古墓篇”以及社会团体公冢的“公冢篇”之外，也特别将“古墓篇”中曾经在马六甲担任甲必丹者的墓碑抽出，另作“甲必丹篇”，针对这些社会领袖的生平事迹进行特别介绍。《墓碑集录》中的墓碑，除了以文字说明和全彩的照片加以呈现之外，也附有简单的统计表及三宝山地图，印刷精美，带领读者从三宝山来了解早期的马六甲先贤，是研究者进入三宝山所必备的参考书。

文献档案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途径，然而，若将时间往前推进，会发现所能使用的文献资料就越少，故让本书作者感叹可供研究的档案“少得令人感到失望”（页5）。类似的经验应该不仅限于黄文斌一人，从事马新早期华人史的研究者，多少都有此同感。也因为档案的有限，学界近年来开始重视义山墓碑的史料价值。¹三宝山是马新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义山，那些曾经在马六甲生活过的华人大多都长眠于此。由于义山墓碑所记录的，是人们的姓名、祖籍、所属朝代、卒年以及生前荣誉等资讯，是华人身份以及认同行为的一种标记，因此墓碑资料可说是档案文献之外，还原早期华人社会面貌的另外一种途径。也因为如此，《墓碑集录》成为了解马六甲华人历史的基本史料。

* 白伟权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候选人。电邮地址：hgking1000@yahoo.com

¹ 例如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的福建义山计划，此外就笔者所知，至少在新加坡、边佳兰、檳城、太平、古来、新山等地，都有许多研究者进行墓碑抄录工作。

墓碑属碑铭的一种，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末，学界便已经逐渐注意到碑铭的史料价值，因此一些碑铭集也在这个时候开始相继出版，例如饶宗颐（1969）的〈星马华文碑刻系年〉、陈荆和与陈育崧（1970）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傅吾康及陈铁凡在1980年代所编的三册《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张少宽（1997）的《槟榔屿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铭集》、庄钦永（1998）的〈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以及张少宽（2013）的《槟榔屿华人寺庙碑铭集录》。综观上述碑铭集，其收录的对象主要是寺庙、会馆组织、学校以及义山的碑文，针对义山墓碑的搜集并非他们的主轴，因此黄文斌的三宝山墓碑集录可算是继张少宽《槟榔屿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铭集》和庄钦永〈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之后，马来西亚第三本专门收录义山墓碑的碑铭集。

这三本墓碑碑铭集的差异在于，张氏的碑铭集主要着重于地方史论述的部分，墓碑则扮演了新史料和分析工具的角色，故除了一些著名的家族人物之外，较没有将福建公冢的墓碑全部进行陈列。庄氏的碑铭集除了针对马六甲和新加坡名门望族及社会领袖的墓碑进行搜集之外，主要还是站在方法论的角度，说明墓碑所能呈现出的风俗习惯、社会特征以及望族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六甲因为是华人研究领域中长期被关注的对象，因此前人累积了相当多的成果。以马六甲的名人和甲必丹为例，早已经在日比野丈夫（1969、1991）、黄存燊（1965）²、庄钦永（1986、1988a、1988b、1992）、郑良树（1984）、骆静山（1984）等前人的许多论著中提及，使得《墓碑集录》难以在史料上突破前人的成果。是故，《墓碑集录》只能采取述而不论³的路线，将重点放在资料成列的部分，同时将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汇整，因此它是一部相当实用的工具书。然而笔者认为，《墓碑集录》最可贵的地方并非本书所收录的甲必丹墓，而应该在于后面的一般古墓和公冢。

这些一般墓碑的墓主虽然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只是普通的个人，但大量搜集之后，针对其祖籍来源、姓氏、卒年、墓碑形式等资讯进行整理，却能够让读者更加了解不同时期社会的族群组成、人口增长、认同转变等社会概况。这部分资料主要呈现于本书的“古墓抄碑记录表”之中，该表资料实际上是以1985年“三宝山坟墓调查记录表”为蓝本，再进行实地调查的结果，作者在叙述时，也忠实地呈现了本次调查与1985年的资料差异，除指出新的发现，也交代了缺少的墓碑。利用这些资料，作者针对了墓主的籍贯和名字进行了简单的统计，其中在姓名方面，作者也注意到了早期女性和男性的姓名特色，以及谥、号、讳之间的使用，从而对应至早期马六甲的社会脉络，这是相当有趣的想法。然而，在墓主姓名统计方面，笔者认为仍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即作者将“光”和“德”、“明”⁴视为是乾隆与嘉庆时期男性取名的“价值观”，但比对这些墓主和该时期墓碑的母数，前者仅占5.1%，后者仅占8.8%和7.4%，故这样的比重是否能作为一项趋势，仍值得进一步讨论。

² 张清江曾于2006年将黄存燊、庄钦永、日比野丈夫、郑良树有关甲必丹的文章，收录编译成《新马华人甲必丹》一书。

³ 述而不论乃地方志和工具书常见的处理方法。

⁴ 即乾隆时期的5个“光”（页65），和嘉庆时期的6个“德”及5个“明”（页80），两个时期的样本总数分别为97和68个。



此外，本书架构虽然明确，前言也提及了三宝山墓碑调查的意义，但有关墓碑调查进一步的具体操作，如调查的取样标准⁵、人员分工情形、抄碑顺序的制定、范围与界限、文字、影像及GPS资料的后续处理等内容，却着墨较少。这些工作看似简单，但在技术上都相当具有挑战性，若能将这部份多加着墨，一些值得延续和借鉴的经验便能够得到传承，也能加深本书整体的严谨度。此外，由于1985年马六甲华社曾经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墓碑抄录工作，该次所记录的墓碑共有六千余座，但无论在本书标题年代的下标或是内容，均未包含前述成果，倘若《墓碑集录》未具体点出此次抄碑计划与1985年墓碑记录工作的区别，便难以真正凸显全书的价值。

除此之外，本书在编辑方面，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期待在未来再版的时候能加以修正。首先是本书在编辑说明的第五项“1985年《三宝山坟墓调查记录表》”中提及将此调查表的六千多笔资料，以光碟的方式附录在书本中，但询及书商及出版社，均表示书本并没有附送光碟，这是较为遗憾的地方。再者，不同于以往抄碑仅限于文字与图像的纪录，在本次的抄碑计划中，还结合了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这项新技术，即将每个墓碑加以定位，此资料保存的形式在马来西亚可算是相当新的途径。利用此技术，研究者可将每块墓碑的点位资料按照祖籍或年代呈现在既有的地图上，效果将比表二和表七的墓碑所在区域统计表来得更为具体，但可惜本书并未将GPS定位资料加以呈现。

除了空间资料之外，《墓碑集录》在祖籍地统计表中的行政区划亦出现了分类上的问题，即作者将墓主的祖籍地作了“省”和“县、镇、村”两项分类。然而，在以闽南人为优势的马六甲，除了“省”这一分类之外，较有意义的祖籍分类应是“省”底下的“府”。再者，“府”以下的“县”也是闽南移民社会中，重要的地缘分类，无论是在闽南人聚集的新加坡、檳城以及台湾，“府”、“县”都是划分人群的主要依据。此外，“镇”和“村”并非明清时代的行政区划，因此不建议将“县”与“镇、村”归为同一个单位。另一方面，在“县、镇、村”的栏位中，祖籍地注解也常出现时空交错的问题，即清代行政区划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交杂使用的现象，如“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市”等，建议加以统一。另外，“皇清”为朝代隶属标记，不适合放置于籍贯的栏位之中。也因为统计表处理得较为粗糙，并且没有妥善地结合1985年坟墓调查纪录表中的庞大资料，因此作者难以用三宝山古墓勾勒出马六甲人口和帮群结构动态变迁的图像，使得这些墓碑资料的意义只局限于证明华人曾经存在的事实。

虽然书本的内容确实有一些缺憾的地方，但无可否认，作者身兼多职，集学校行政、教职与学术研究等事务于一身，在百忙之中主持额外的计划，亲自带领学生数次由霹雳南下马六甲抄碑，这样的工作量并非每个人都能负荷。笔者了解，在义山调查墓碑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不仅要忍受日晒雨淋、虫蚁甚至水蛭的叮咬、克服禁忌上的心理障碍，更重要的是在僻静的义山上顾及人身的安全。黄文斌所面对的三宝山，面积达40公顷，墓碑数量更超过6,000座，如此大的数量在处理上确实不易，一旦在抄录过程中有所疏漏，便难以再回头进行修改。这样的工作量加上计

⁵ 是普查式的搜集，抑或是系统性抽样式的搜集，还是根据特定名单加以搜集。

划的期程限制，出现些许缺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论如何《墓碑集录》是一项重要的尝试，也是本地墓碑抄录工作经验的累积。更重要的是，在工作过程中，他们结合了在地社群共同参与，让社区居民重新对于自己乡土有更深一层的体认，这才是本书最重要的价值所在。诚如作者所说，“没有历史文献，即无法进行良好的学术研究”（页5），笔者期待将来能有更多地方也能有类似的出版，一方面继续保存地方历史，另一方面也补足档案文献的阙如。

参考文献

- 陈荆和、陈育崧，1970，《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 傅吾康、陈铁凡，1982，《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一），吉隆坡：马来亚大学。
- 傅吾康、陈铁凡，1985，《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
- 傅吾康、陈铁凡，1987，《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三），吉隆坡：马来亚大学。
- 黄存燊，1965，《华人甲必丹》，新加坡：国家语文局。
- 黄存燊等著、张清江编译，2006，《新马华人甲必丹》，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 骆静山，1984，〈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年商榷〉，《亚洲文化》，第4期，页35-36。
- 饶宗颐，1969，〈星马华文碑刻系年〉，《新加坡大学中文学刊》，第10期，页1-51。
- 饶宗颐，1970，〈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书目季刊》，第5卷第2期，页3-33。
- 日比野丈夫，1969，〈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东南亚细亚研究》，第6卷第4号，页88-108。
- 日比野丈夫著，潘明智译，1991，〈马六甲华人甲必丹——关于近年新发现的资料〉，《亚洲文化》，第15期，页116-120。
- 张少宽，1997，《槟榔屿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铭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 张少宽，2013，《槟榔屿华人寺庙碑铭集录》，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
- 郑良树，1984，〈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补义〉，《亚洲文化》，第3期，页2-7。
- 庄钦永，1986，〈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补遗〉，《亚洲文化》，第7期，页100-101。
- 庄钦永，1988a，〈“甲政曾振耀考”补遗〉，《亚洲文化》，第11期，页115-117。
- 庄钦永，1988b，〈甲必丹曾有亮墓之发现〉，《亚洲文化》，第11期，页118-119。
- 庄钦永，1992，〈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新考〉，《亚洲文化》，第16期，页56-59。
- 庄钦永，1998，〈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民族学研究所资料汇编》，第12期，页1-232。